

国家审计理论建设专栏

国家审计与地区相对贫困治理

——基于 2008—2017 年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祝遵宏^{1a}, 方毅峰^{1b}, 黄莎莎²

(1. 南京审计大学 a. 工程审计学院, b. 政府审计学院, 江苏南京 211815; 2. 西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成都 611130)

[摘要] 基于我国 257 个城市 2008—2017 年的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各功能对相对贫困治理成效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究国家审计各功能的协同作用、公众参与对国家审计促进相对贫困治理的调节作用以及国家审计对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促进作用的异质性。研究发现: 国家审计“治已病”“防未病”和“经济体检”综合功能的发挥能显著促进相对贫困治理成效, 而“查病”功能则没有直接对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产生促进作用; “查病”功能能够与“治已病”“防未病”功能发挥协同效应, 产生更为明显的相对贫困治理成效; 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能强化国家审计对相对贫困治理的促进作用; 国家审计对相对贫困治理的促进作用在财政依赖程度、公共服务缺口大小不同的地区存在异质性。

[关键词] 国家审计; 经经济体检; 查病; 治已病; 防未病; 公众参与; 相对贫困

[中图分类号] F23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23)02-0014-10

一、引言

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和重要保障, 国家审计在党和国家带领全国人民夺取脱贫攻坚战胜利的过程中, 坚持将精准扶贫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等列为审计工作的重点内容, 大力开展扶贫专项资金审计、扶贫政策跟踪落实审计等工作, 有效规范了扶贫资金的使用和扶贫政策的落实, 为保障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审计署 2018 年第 46 号公告, 仅在 2018 年 1 月至 3 月, 审计署就组织各级审计机关重点对 2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45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含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2017 年扶贫政策措施落实和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以及部分东部省份落实东西部扶贫协作相关政策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中抽查扶贫资金 625.85 亿元, 涉及 1159 个乡镇、4013 个行政村和 2603 个单位, 并入户走访 1.52 万个贫困家庭; 共查出违纪违法、损失浪费、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金额 39.75 亿元, 占抽审资金的 6.35%, 发现部分地区存在政策资金落实不到位、脱贫工作不实等问题, 有效提高了地方政府的扶贫成效。

2020 年 11 月 23 日, 贵州晴隆等 9 个县成功脱贫摘帽, 顺利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标志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是, 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结束, 考虑到相对贫困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长期存在, 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将成为后扶贫时代党和国家全面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1-2]。在 2018 年 9 月发布的《审计署关于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加强审计监督的意见》中, 审计署将“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加强审计监督”明确列为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和审计监督推动政策落实、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021 年 3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 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那么, 国家审计在治理地区相对贫困、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过程中究竟能否发挥促进作用, 其中又存在着怎样的影响机制? 厘清上述问题有助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对后扶贫时代有效治理地区相对贫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 2022-09-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XZZ002);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CX22_2181)

[作者简介] 祝遵宏(1972—), 男, 河南固始人, 南京审计大学工程审计学院教授, 从事国家审计研究; 方毅峰(2000—), 男, 安徽六安人, 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从事政府审计与环境治理研究, 通讯作者, E-mail: fy99123@163.com; 黄莎莎(1992—), 女, 广西贺州人, 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事能源经济与环境政策研究。

既有文献发现,公共支出和公共政策是治理地区贫困与相对贫困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公共财政支出具有一定的“亲贫性”^[3],能够促进地区各类公共服务建设水平的完善^[4-5],进而缓解贫困人口能力和权利的贫困^[6]。另一方面,兜底保障、扶贫小额信贷、普惠金融等扶贫政策也能够实现贫困人口的有效增收,从而治理地区相对贫困^[7-8]。国家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监督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凭借其超然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有效提升地方政府的工作透明度并解决腐败问题^[9-10],进而在地方政府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缩小当地公共服务供给缺口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经济监督作用^[11-12]。然而,鲜有学者将信息不对称与委托代理问题纳入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分析框架,直接探讨国家审计对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成效,为数不多的文献也仅探讨了国家审计和贫困治理之间的关系^[13-14],这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较大的探索空间。

本文基于我国2008—2017年的市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国家审计对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效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中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实证检验了国家审计对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正向作用和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各功能的协同治理作用,为国家审计促进相对贫困治理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二是探究公众参与和国家审计促进相对贫困治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拓展了国家审计功能发挥的外在影响因素研究。三是研究国家审计在地区财政依赖度和公共服务缺口大小不同时所产生的相对贫困治理效应异质性,丰富了国家审计监督治理功能的异质性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达成,贫困问题已经由绝对贫困转为相对贫困,由收入的贫困转向能力和权利的贫困^[15-16]。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涓滴效应并不能自发地流向贫困人口^[2],因此在致力于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后扶贫时代,就需要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通过公共政策、公共财政等方式解决贫困人口能力和权利的贫困,进而治理相对贫困问题^[6,17]。

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地方政府的相对贫困治理工作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病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尽管国家要求地方政府的贫困治理工作透明公开,但这种公开往往流于形式^[18],人民群众难以了解具体的状况,这为地方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契机。同时,由于逆向选择问题的存在,地方政府难以准确了解群众的具体情况,相关政策和资金的落实可能会与初衷相悖。二是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我国的贫困治理工作中会产生“军令状”^[19]。这种“军令状”式的任务下达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相对贫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同时会导致应对“军令状”的策略性行为的产生。例如,有些地方政府谎报自己的工作成果;有些地方政府采用短效又缺乏内生动力的输血式脱贫;有些地方政府倾其资源打造“面子”工程。这些策略性行为使得相对贫困治理浮于表面,违背了“军令状”设立的初衷。上述“病症”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就会导致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工作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国家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监督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常态化的“经济体检”功能,在地方政府治理相对贫困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其“查病”“治已病”和“防未病”的重要职能,有效医治因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而产生的“病症”。

首先,国家审计能够充分发挥其“查病”功能,缓解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益于宪法、审计法赋予的超然独立性和权威性,审计机关在执行相关扶贫审计工作时,既不会有任何利益的牵绊,也不会受到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20]。审计法第十七条规定,“审计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审计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不得打击报复审计人员”,这确保了审计机关从事审计工作的客观性与独立性,并为其深入开展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具体而言,审计机关通过开展与相对贫困治理有关的专项资金审计、政策落实跟踪审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等审计活动,能够有效揭示其中可能存在的策略性扶贫、贪污腐败、虚假冒领等机会主义行为,实现地方政府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公开化、透明化。同时,审计机关还会依法向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直接向相关主体施加舆论压力,从而有效约束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工作^[21]。综上,审计机关在实施审计工作的过程中,能够及时揭示并披露各项问题,促进地方政府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公开化与透明化,并对相关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规范作用,从而有效提升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成效。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

H1: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家审计“查病”功能发挥的作用越强,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成效越好。

其次,国家审计可以发挥“治已病”功能,及时纠正相对贫困治理工作中被审计揭示的相关问题。我国审计法规定,在法律职权的范围之内,审计机关应当针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予以处理处罚;针对需要移送相关部门的予以依法移送。具体到相关审计工作,审计机关在发现因信息统筹不到位而导致的政策资金落实偏误或地方官员为应对“军令状”而实施策略性行为等问题之后,能够及时矫正错配的政策资源,促使其重新正确运用到相对贫困的治理工作中。针对地方官员私自挪用浪费、贪污腐败、优亲厚友等违法违规行为,审计机关也能够依法直接实施处理处罚,并将相关审计线索移送至司法纪检部门推动问责。同时,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制度安排,国家审计的处理处罚和问责无疑增加了地方官员实施违规行为所需支付的成本与风险,迫使地方官员在进行违规行为决策时,不得不将审计机关的处理处罚纳入考量范围^[22]。当违规行为所需支付的成本大于获得的收益时,理性的地方官员就会放弃机会主义行为,规范其在治理地方相对贫困问题时政策资金的使用落实。综上所述,国家审计在揭示相关问题之后,能够及时纠正偏离相对贫困治理目标的经济行为,并通过强有力的处罚和移送产生威慑效应,有效抑制潜在违规者可能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确保地方政府在相对贫困治理工作中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23]。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

H2: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家审计“治已病”功能发挥的作用越强,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成效越好。

再次,国家审计还能发挥“防未病”功能,帮助地方政府完善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政策制度。尽管通过规范的审计程序,国家审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问题并予以处理处罚,但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实现被审单位规则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屡审屡犯”问题的产生^[24]。凭借审计人员积累的丰富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国家审计在揭示处理相关问题之后,能够分析总结经验得失,对症下药,通过审计报告、审计专报等形式,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和审计建议,不仅包括能防止已有问题再次产生的预防性建议,还包括能完善政策资金落实的改善性建议,能够有效地帮助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或单位完善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相关制度、体制和机制^[10]。同时,审计机关还会持续跟踪关注被审单位审计建议的采纳落实情况,以确保相对贫困治理工作问题漏洞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预防。以审计署 2018 年第 2 号公告为例,仅在 2017 年第 4 季度,审计机关就持续关注了脱贫攻坚等重点民生领域政策落实和重大项目推进情况,并针对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工程推进不力等问题提出建议,促使相关地区和部门出台配套政策 389 项,推动 5037 个扶贫项目加快实施。由此可见,国家审计的“防未病”功能为地方政府相对贫困治理程序和制度的改进优化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建议与决策支持,从而确保了政策资金的精准合理落实。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

H3: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家审计“防未病”功能发挥的作用越强,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成效越好。

最后,国家审计的“经济体检”功能并不是单独地发挥相对贫困治理作用,而是“查病”“治已病”“防未病”三者的有机结合与循环促进^[25]。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国家审计不仅可以通过“查病”功能持续而全面地掌握地方政府相对贫困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能够在“查病”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治已病”和“防未病”功能实施处罚、提出整改建议,从而实现纠正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执行偏差、完善相关政策资金落实制度和程序的“终极目标”。具体而言,“查病”是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功能发挥的基础,只有查出地区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审计机关才能获得实施处罚、提出审计建议的相关依据。并且揭示问题的数量越多、情况越严重,审计机关可以实施的处罚力度就越大,提出的审计建议也会越有说服力。“治已病”是国家审计发挥相对贫困治理作用的重要保障,即使被审单位对于审计机关提出的相关审计建议落实程度存在不足,处理处罚和移送产生的纠偏作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被审单位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的违规行为。“防未病”则是建立在“查病”和“治已病”的基础上,规范和完善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有效手段,不论是揭示问题所发挥的曝光效应还是实施处罚所产生的威慑作用,都能够促进被审单位落实审计建议,从而规范和完善其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制度与程序。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4。

H4: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家审计的“经济体检”综合功能发挥的作用越强,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成效越好。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市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直辖市的特殊性和数据资源的完整性,本文剔除了我国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和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样本,最终选取 2008—2017 年 257 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实证研

究。其中,涉及国家审计相关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2009—2018年《中国审计年鉴》,其余变量来自2009—201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区市的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通过各市的统计公报进行补充。同时,本文所有实证分析均采用软件stata17.0进行。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相对贫困水平。现有研究对于相对贫困水平的认定尚未达成共识, 主要测度方法是基于收入的比例法^[26]和基于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法^[27]等。比例法是指先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或平均数的固定比例定义为相对贫困线, 然后把可支配收入低于相对贫困线的群体认定为相对贫困。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 不同学者对于具体比例的选择较为多样化, 且数据的获取与计算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 本文选择使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各个城市的相对贫困水平。另外, 考虑到相对贫困的存在并不仅仅局限于农村地区^[1,28], 本文选择全体居民的恩格尔系数(Engel)作为城市相对贫困水平的衡量指标。

2. 解释变量: 国家审计。关于国家审计“经济体检”的各功能, 参考已有研究^[12], 在“查病”功能方面, 根据前文的分析, 国家审计主要通过开展各项审计活动揭示地方相对贫困治理的问题, 以发挥“查病”的作用, 因此本文选择审计查出主要问题金额加1的自然对数(Reveal)进行衡量; 在“治已病”功能方面, 考虑到处理处罚与整改是国家审计“治已病”功能的主要体现^[25], 本文选取审计处理落实金额加1的自然对数(Heal)作为“治已病”的代理变量; 在“防未病”功能方面, 本文选择审计机关提出审计建议加1的自然对数(Prevent)来衡量, 主要原因在于审计机关可以根据审计发现的问题提出对应的审计建议, 提升国家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能力^[29]; 在国家审计“经济体检”的综合功能方面, 借鉴既有研究^[12], 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国家审计“查病”“治已病”和“防未病”三项功能进行降维处理, 得到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各功能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 然后根据累积方差贡献率大于80%的原则

选取其中前两个因子作为主成分, 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85.64%, 最后根据各自的方差贡献率进行加权平均, 得到各城市的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功能综合指数。

3. 控制变量。借鉴相关文献^[2,8], 本文选择对外开放水平、工业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受教育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水平、金融发展程度、政府规模作为控制变量。此外, 为了消除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对回归结果带来的影响, 本文还在模型中加入了城市和年份的虚拟变量。

相关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三) 模型设计

为了验证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各功能对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促进作用, 本文构建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Engel_{i,t} = \alpha_1 + \alpha_2 Govaudit_{i,t} + \alpha_3 Controls_{i,t} + \sum Year + \sum City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 $Govaudit_{i,t}$ 代表 i 城市 t 年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各功能的发挥, 即为前文所提及的“查病”功能(Reveal)、“治已病”功能(Heal)、“防未病”功能(Prevent)和“经济体检”综合功能(Audit); $Engel_{i,t}$ 为 i 城市 t 年的恩格尔系数; $Controls_{i,t}$ 为控制变量; $\sum Year$ 为年份虚拟变量; $\sum City$ 为城市虚拟变量; ε 为随机扰动项。同时, 为了控制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自相关等问题, 本文在回归中采用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系数 α_1 代表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各功能对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效果。考虑到衡量相对贫困水平的恩格尔系数为正向指标, 恩格尔系数越高意味着相对贫困水平越高, 因此本文预期 α_1 的符号显著为负。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恩格尔系数(Engel)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为0.35, 最大值为0.74, 最小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衡量方式
被解释变量	恩格尔系数	Engel	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与总支出的比值
解释变量	“查病”功能	Reveal	审计查出主要问题金额加1的自然对数
	“治已病”功能	Heal	审计处理落实金额加1的自然对数
	“防未病”功能	Prevent	审计机关提出审计建议加1的自然对数
	“经济体检”功能	Audit	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得出
控制变量	对外开放水平	FDI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自然对数
	工业发展水平	Ind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自然对数
	信息化水平	Infor	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的自然对数
	受教育水平	Edu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数的自然对数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Invest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自然对数
	金融发展程度	Loan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自然对数
	政府规模	Govscale	公共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

值为 0.11, 说明样本间相对贫困水平的分布较为均匀, 但不同城市的相对贫困水平有所不同。国家审计“查病”功能(*Reveal*)的均值为 12.16, 最小值为 0, 最大值为 16.91; “治已病”功能(*Heal*)的均值为 11, 最小值为 0, 最大值为 19.38; “防未病”功能(*Prevent*)的均值为 6.29, 最小值为 0, 最大值为 8.66, 说明不同城市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各功能的发挥强度都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 基准回归分析

表 3 报告了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各功能与地区相对贫困水平的回归结果(未列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 备索)。首先, 由表 3 中列(1)结果可知, *Reveal* 的系数为正, 但不显著, 说明国家审计“查病”功能并不能单独对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产生明显的促进效应, H1 并未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在于: 当前社会的公众参与程度普遍较低, 审计机关揭示的问题难以得到及时广泛的关注, 因此审计机关揭示问题产生的威慑力不足, 对于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水平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22]。其次, 根据表 3 中列(2)的结果可知, *Heal* 的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国家审计确实能够及时矫正错配的扶贫政策资金, 确保相对贫困治理资源的高效使用, 并通过增大“治已病”功能的实施力度而产生强有力的威慑作用, 减少相对贫困治理工作中潜在的违规可能性, H2 得到有效验证。

再次, 由表 3 中列(3)的结果可知, *Prevent* 的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在地区治理相对贫困的过程中, 国家审计“防未病”功能可以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和审计建议, 并督促落实整改, 从而完善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规则制度, 提高了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成效, H3 得到有效验证。最后, 由表 3 中列(4)的结果可知, 国家审计“经济体检”综合功能 *Audit* 的系数为负, 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说明随着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功能总体发挥作用的提升, 地方政府相对贫困治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减少, 相关政策资金落实得更到位, 城市相对贫困水平更低, 即国家审计对地区相对贫困治理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H4 得到有效验证。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各功能与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关系的稳健性, 本文从如下三个方面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是改变自变量的衡量方式。关于国家审计“查病”功能, 本文借鉴朱锦余和李玥萤的研究^[25], 选取审查出主要问题金额与各市 GDP 的比值(*Reveal1*)进行替代; 关于国家审计的“治已病”功能, 考虑到对违规事件的移送处罚可能具备更加明显的威慑作用, 本文借鉴池国华等的研究^[30], 选取审计移送司法纪检部门处理事项加 1 的自然对数(*Heal1*)作为国家审计“治已病”功能的替代变量; 关于国家审计“防未病”功能, 本文将审计机关提出的审计建议除以当年完成的审计项目数量并进行对数化处理, 从而获得了“防未病”功能的替代指标(*Prevent1*); 关于国家审计“经济体检”综合功能, 本文使用主回归的“经济体检”各功能衡量指标通过熵权法重新计算替代(*Audit1*)。

二是更换计量模型。由于本文使用的被解释变量(恩格尔系数)的取值范围处于 0 到 1 之间, 具有一定的受限数据特征, 且似然比检验(LR-test)的检验结果表明显著存在个体效应, 因此借鉴郑石桥和梁思源的研究^[11], 本文采用面板随机效应 Tobit 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分析^①。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Obs	Min	Max	Mean	Median	SD
<i>Engel</i>	2420	0.11	0.74	0.35	0.35	0.07
<i>Reveal</i>	2420	0.00	16.91	12.16	12.28	2.01
<i>Heal</i>	2420	0.00	19.38	11.00	11.19	1.86
<i>Prevent</i>	2420	0.00	8.66	6.29	6.52	1.40
<i>Audit</i>	2420	-6.42	1.95	0.00	0.16	0.96

表 3 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各功能与地区相对贫困水平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查病	(2) 治已病	(3) 防未病	(4) 经济体检
<i>Reveal</i>	0.0018 (1.61)			
<i>Heal</i>		-0.0017 ** (-2.26)		
<i>Prevent</i>			-0.0021 *** (-2.68)	
<i>Audit</i>				-0.0037 *** (-2.86)
<i>_cons</i>	0.0483 (0.32)	0.0602 (0.40)	0.0512 (0.34)	0.0323 (0.2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城市	Yes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R ² _a	0.151	0.153	0.153	0.154
N	2420	2420	2420	2420

注: 括号内是以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t 值, ***、**、*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①由于找不到个体异质性的充分统计量, 如果在混合 Tobit 模型中直接加入面板单位的虚拟变量, 所得的估计量可能是不一致的。因此, 如果 LR 检验拒绝原假设, 则直接选择随机效应 Tobit 模型。

三是将自变量滞后一期处理。由于国家审计与地区相对贫困水平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反向因果关系,即随着地区相对贫困水平的提高,国家审计对该地区的审计力度也会相应增大,而滞后一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反向因果带来的影响,原因在于我国的审计工作主要以事后审计为主,当年的地区相对贫困水平不太可能会影响前一年国家审计功能的发挥。基于此,本文将滞后一期的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各功能变量重新代入模型(1)中进行回归分析。

上述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未列示,备索)与前文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结论是可靠的。

五、进一步分析

(一)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功能的协同作用研究

根据前文的实证分析,国家审计“查病”功能与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促进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查病”功能在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工作中不起任何作用,因为在实践中,国家审计的“查病”“治已病”和“防未病”功能往往不是抽象地单独发挥作用,而是相辅相成、协同作用的,假设4的有效验证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一观点。本文认为,国家审计的“查病”功能能够与“治已病”“防未病”功能产生明显的协同效应,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成效。具体而言,在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过程中,国家审计“查病”功能揭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相关政策资金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越多,审计机关越会实施更为严格的处罚,并纠正越多的政策资源错配问题,这不仅增加了潜在违规者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预期违规成本,产生更为强劲的威慑效应,还进一步规范了相关政策资金的合理落实,确保了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合规性和效率性。同时,揭示的问题越多,审计机关能够总结的经验就越丰富,提出的审计建议质量越会得到显著提高,进而可以越有效地促进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工作。为了验证该协同促进作用,本文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模型:

$$Engel_{i,t} = \beta_1 + \beta_2 Reveal_{i,t} + \beta_3 Heal_{i,t} + \beta_4 (Reveal_{i,t} \times Heal_{i,t}) + \beta_5 Controls_{i,t} + \sum Year + \sum City + \varepsilon \quad (2)$$

$$Engel_{i,t} = \gamma_1 + \gamma_2 Reveal_{i,t} + \gamma_3 Prevent_{i,t} + \gamma_4 (Reveal_{i,t} \times Prevent_{i,t}) + \gamma_5 Controls_{i,t} + \sum Year + \sum City + \varepsilon \quad (3)$$

其中,各变量的含义与模型(1)保持一致。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是模型(2)中的 β_4 和模型(3)中的 γ_4 ,如果 β_4 和 γ_4 显著为负,则说明国家审计“查病”功能发挥得越好,“治已病”和“防未病”功能对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促进作用就越强,两者之间产生了显著的协同促进作用。由表4中列(1)的结果可知,国家审计“查病”和“治已病”交互项 $Reveal \times Heal$ 的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国家审计“查病”功能具有强有力的“无影灯效应”^[31],随着国家审计“查病”功能发挥强度的提高,审计机关能够找出更多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病灶”,此时“治已病”功能在铲除“病因”方面的发挥空间更大,对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证实了“查病”与“治已病”的协同促进作用。由表4中列(2)的结果可知,国家审计“查病”和“防未病”交互项 $Reveal \times Prevent$ 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基于“查病”功能的充分发挥,国家审计“防未病”功能能够提出更多合理有效的审计建议,

从而发挥抵御效应,促进相关制度的完善,提高地区相对贫困效。这与郑石桥和梁思源的研究结论近似^[11],虽然政府审计的揭示、处罚和建议功能对公共支出效率单独发挥的作用有限,但通过三者之间的协同作用,政府审计有效地促进了地区公共支出效率。

(二)公众参与对国家审计促进相对贫困治理成效的调节效应分析

公众参与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国家审计监督相对贫困治理的过程中,社会公众不仅是国家扶贫审计工作的“审视者”和“评价者”,还是“指导者”和“建设者”^[32]。本文认为,社会公众作为地方政府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受益主体,至少能从如下几个方面实现公众参与:首先,社会公众能够为审计机关提供相关审计线索^[30]。相较于审计机关,公众对地方政府相对贫困治理工作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具有

表4 协同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1) 威慑效应	(2) 抵御效应
Reveal	0.0117 *** (3.80)	0.0063 *** (3.20)
Heal	0.0109 *** (2.89)	
Reveal × Heal	-0.0010 *** (-3.58)	
Prevent		0.0069 ** (2.10)
Reveal × Prevent		-0.0008 *** (-2.75)
其他变量	Yes	Yes
R ² _a	0.168	0.158
N	2420	2420

更高的敏感性,他们提供的审计线索可以帮助审计人员突出审计重点,提高国家扶贫审计的“查病”效率。其次,社会公众通过持续监督审计工作过程,促进地方政府对相关违法违规问题的处理落实。查出问题只是社会公众的表层审计需求,更深层次的审计需求则是落实处理发现的违法违规事件,并纠正相关政策资金重新正确落实。当地方政府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有消极不作为情况时,社会公众能够通过媒体、论坛等方式发动社会问责,迫使审计机关的整改、问责和建议生效^[22]。最后,社会公众通过审计结果公告能够了解相关的审计项目、问题和处理结果,审视和评价国家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合法合规性。同时,审计结果的公告还能提高社会公众对审计机关的信任感,增加其与审计机关合作的可能性,形成审计机关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为了验证公众参与程度对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各功能促进相对贫困治理的调节作用,本文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模型:

$$Engel_{i,t} = \delta_1 + \delta_2 Govaudit_{i,t} + \delta_3 Pub_{i,t} + \delta_4 (Govaudit_{i,t} \times Pub_{i,t}) + \delta_5 Controls_{i,t} + \sum Year + \sum City + \varepsilon \quad (4)$$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发展,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公众向审计机关提供审计线索、监督审计工作过程和发动社会问责的主要手段,而新媒体也是审计机关发布审计结果公告和处理处罚决定的主要形式。因此,借鉴既有研究^[33],本文将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的自然对数(Pub)作为公众参与程度的代理变量,其余变量的衡量均与模型(1)保持一致。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是公众参与和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各功能的交互项 $Govaudit \times Pub$,如果该交互项的系数 δ_4 显著为负,则说明公众参与能显著增强国家审计对相对贫困治理的促进成效,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从表 5 的实证结果来看,不论是国家审计的“查病”“治已病”和“防未病”功能,还是国家审计的“经济体检”综合功能,其与公众参与交互项的系数均为负,且至少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在国家治理相对贫困的过程中,社会公众的参与确实能够帮助审计机关锁定扶贫工作中的违法违规问题,促使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审计问责,并加速审计建议的采纳和落实,同时随着地区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审计机关对相关问题的揭示、处罚和建议也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及时广泛关注,从而强化了政府审计的威慑作用,可以有效约束地区的相对贫困治理工作。

(三) 异质性分析

1. 财政依赖

在地方政府治理地区相对贫困的过程中,上级政府往往会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资金倾斜等方式为其提供有力的支持,这种支持虽然在提高贫困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地方政府对上级财政补助资金的过度依赖^[34]。具体而言,当过度依赖上级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时,地方政府在治理地区相对贫困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惰性”,更多地采取短效又缺乏内生动力的输血式扶贫方式,还会导致对上级政策支持资金的滥用和使用效率的低下。同时,过度的财政依赖还给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等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更多的契机。为了持续获得上级的财政政策支持,地方官员可能会谎报地区的相对贫困治理状况。针对由于过度财政依赖而导致的相对贫困治理效率低下问题,本文认为国家审计在直接促进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成效的同时,还会对地区财政依赖产生显著的治理效应,从而进一步提高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成效。基于此,借鉴相关文献^[34-35],本文选取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差距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比值作为地区财政依赖程度的代理变量,并根据地区财政依赖程度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分别对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同时,本文还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Fisher's

表 5 公众参与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查病	(2) 治已病	(3) 防未病	(4) 经济体检
Reveal	0.0100 *** (2.92)			
Reveal × Pub	-0.0022 ** (-2.56)			
Heal		0.0098 *** (2.92)		
Heal × Pub		-0.0028 *** (-3.46)		
Prevent			0.0023 (1.13)	
Prevent × Pub			-0.0013 ** (-2.22)	
Audit				0.0106 ** (2.08)
Audit × Pub				-0.0037 *** (-2.92)
Pub	0.0212 ** (2.12)	0.0266 *** (2.90)	0.0063 (1.25)	-0.0030 (-0.84)
其他变量	Yes	Yes	Yes	Yes
R ² _a	0.160	0.165	0.155	0.160
N	2410	2410	2410	2410

注:因为公众参与代理变量存在部分缺失,所以参与该回归的总体样本量有所减少。

Permutation test)进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并通过 Bootstrap 法进行 1000 次自体抽样得到相应的经验 p 值。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根据表 6 中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可知,不论是在财政依赖程度高的城市还是在财政依赖程度低的城市,国家审计“查病”功能的系数均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费舍尔检验得到的经验 p 值为 0.267,说明国家审计“查病”功能均未对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成效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两者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列(3)中 *Heal* 的系数为 -0.0027,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列(4)中 *Heal* 的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且组间差异检验的经验 p 值为 0.065;列(5)和列(6)中 *Prevent* 的系数均为负数,但列(6)中 *Prevent* 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列(7)中 *Audit* 的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列(8)中 *Audit* 的系数不显著,说明相较于财政依赖程度低的地区,国家审计“治已病”“防未病”和“经济体检”综合功能对财政依赖程度高的城市具有更强的相对贫困治理促进作用。其中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在于:在财政依赖程度更高的地区,地方官员存在更高的违规可能性,而国家审计在揭示相关问题后能够实施更加严厉的处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针对由于财政依赖程度过高而引发的规章制度问题提出审计建议,督促相关单位落实整改,从而更为有效地促进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成效提高。

表 6 财政依赖分组的回归结果

变量	财政依赖							
	查病		治已病		防未病		经济体检	
	(1)	(2)	(3)	(4)	(5)	(6)	(7)	(8)
高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Reveal	0.0025 (1.51)	0.0012 (0.88)			-0.0005 (-0.40)			
Heal			-0.0027 *** (-2.81)					
Prevent				-0.0027 ** (-2.17)	-0.0011 (-1.08)			
Audit						-0.0053 *** (-2.84)	-0.0015 (-0.79)	
其他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 ² _a	0.117	0.224	0.122	0.223	0.120	0.224	0.122	0.223
N	1210	1210	1210	1210	1210	1210	1210	1210
经验 p 值	0.267		0.065		0.143		0.072	

2. 公共服务供给短板

为了缓解后扶贫时代地区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所导致的相对贫困问题,就需要加快推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社会公众提供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28],从而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在于及时补齐公共服务供给短板,避免“重经济建设、轻公共服务”的政府支出偏向^[12]。国家审计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经济监督机制,在进行相关的审计活动时,自然会关注地方的公共服务供给状况,并充分发挥其“经济体检”功能,有效帮助地方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基于此,借鉴既有文献^[12,36],本文从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方面选取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视化成果^①,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维处理,获得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Score,接着按照模型(5)计算得出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相对缺口 PS。

$$PS_{i,t} = 1 - \left[\left(\frac{Score_{i,t} - Avgscore_t}{\sigma_{Score,t}} \right) / Max \left(\frac{Score_{i,t} - Avgscore_t}{\sigma_{Score,t}} \right) \right] \quad (5)$$

其中,i 和 t 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Avgscore_t 代表某省区市第 t 年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均值,σ_{Score,t} 代表某省区市第 t 年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标准差,PS 越大则代表某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短板越明显。然后,我们将样本根据公共服务供给短板 PS 的中位数分为两组,分别对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同样地,本文也在表末报告了组间差异检验的经验 p 值。具体实证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的回归结果显示,列(1)和列(2)中 *Reveal* 的系数均未通过任何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组间差异检验的经验 p 值为 0.462,说明国家审计“查病”功能在公共服务供给缺口不同的地区并未产生明显的相对贫困治理成效促进作

^①具体而言,本文选择的公共服务可视化成果为中学师生占比、小学师生占比、万人均医院床位数、万人均医生数、万人均公共汽车数、万人均道路面积、万人均供水量、万人均用电量。

用和地区异质性。列(3)中 Heal、列(5)中 Prevent、列(7)中 Audit 的系数均为负数,且至少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列(4)中 Heal、列(6)中 Prevent、列(8)中 Audit 的系数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国家审计“治已病”“防未病”和“经济体检”综合功能在公共服务供给缺口更为明显的地区发挥了更加显著的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在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明显短板的地区,国家审计不仅能有效缓解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中可能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确保政策资金的高效落实,还可以凭借其独立性和专业性及时揭示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问题与短板,并进一步规范矫正地区公共支出的资源错配,进而缓解地区相对贫困问题,实现乡村振兴。

表 7 公共服务缺口分组的回归结果

变量	公共服务缺口							
	查病		治已病		防未病		经济体检	
	(1) 大	(2) 小	(3) 大	(4) 小	(5) 大	(6) 小	(7) 大	(8) 小
Reveal	0.0017 (1.07)	0.0015 (1.03)						
Heal			-0.0031 *** (-3.65)	0.0006 (0.52)				
Prevent					-0.0023 ** (-2.19)	-0.0013 (-1.20)		
Audit							-0.0051 *** (-3.09)	-0.0008 (-0.42)
其他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 ² _a	0.120	0.190	0.130	0.189	0.123	0.190	0.127	0.188
N	1279	1141	1279	1141	1279	1141	1279	1141
经验 p 值	0.462		0.018		0.265		0.065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 257 个城市 2008—2017 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各功能对相对贫困治理成效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国家审计各功能的协同作用、公众参与对国家审计促进相对贫困治理的调节作用以及国家审计对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促进作用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国家审计的“治已病”“防未病”和“经济体检”综合功能均对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查病”功能的促进作用则主要通过与“治已病”和“防未病”功能的协同得以实现。这意味着政府审计能够通过单独和协同的方式对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工作产生有效的促进作用。(2)公众参与程度对于国家审计促进相对贫困治理成效具有显著的增量作用,表明公众参与是强化政府审计威慑作用、提高相对贫困治理成效的重要影响因素。(3)当城市的财政依赖程度较高或公共服务缺口较大时,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各功能能够发挥更为有效的相对贫困治理作用,即政府审计能够及时解决地区的财政依赖问题,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从而缓解地区相对贫困问题。

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大力发挥国家审计“经济体检”功能,为后扶贫时代国家相对贫困治理工作保驾护航。在针对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工作实施审计时,审计机关首先需要充分揭示可能存在的政策落实偏误、策略性行为和贪污腐败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予以严格的处理处罚,并依法进行结果公告,同时还要切实开展研究型审计,不断加强对审计成果的利用,有针对性地提出审计建议,并逐条逐项要求整改落实,从而实现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规范化、效率化。二是创新社会公众参与审计监督的渠道。把社会公众作为国家审计监督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丰富社会公众参与相对贫困治理审计工作的渠道;从扶贫审计的项目立项到审计过程和审计结果,全过程探索社会公众参与的方式,并把公众的声音和需求作为确立审计项目、审计实施重点的重要参考;完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促进审计机关与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 [1] 叶兴庆,殷浩栋. 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缓解相对贫困:中国减贫历程与 2020 年后的减贫战略 [J]. 改革,2019(12):5—15.
- [2] 刘明慧,章润兰. 财政转移支付、地方财政收支决策与相对贫困 [J]. 财政研究,2021(4):34—49.
- [3] 卢盛峰,陈思霞,时良彦. 走向收入平衡增长:中国转移支付系统“精准扶贫”了吗? [J]. 经济研究,2018(11):49—64.

- [4] 王娟,张克中. 公共支出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2012(1):31–42.
- [5] Yang Y,Guo X. Universal basic education and the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Evidence from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2020,25(4):611–633.
- [6] 李永友,沈坤荣. 财政支出结构、相对贫困与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2007(11):14–26 + 171.
- [7] 罗良清,平卫英,单青松,等. 中国贫困治理经验总结:扶贫政策能够实现有效增收吗? [J]. 管理世界,2022(2):70–83 + 115.
- [8] 李建军,韩珣. 普惠金融、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推进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框架选择[J]. 金融研究,2019(3):129–148.
- [9] 朱荣. 国家审计提升政府透明度的实证研究——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4(3):23–30.
- [10] Avis E,Ferraz C,Finan F. Do government audits reduce corruption? Estimating the impacts of exposing corrupt politician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8,126(5):1912–1964.
- [11] 郑石桥,梁思源. 国家审计促进公共支出效率的路径与机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8(2):29–38.
- [12] 韩峰,吴雨桐. 国家审计治理有助于补齐公共服务供给短板吗? [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8(5):21–34.
- [13] 吕劲松,张金若,黄崑. 扶贫政策跟踪审计能促进脱贫攻坚吗? ——基于西南四省/直辖市的经验证据[J]. 财政研究,2019(5):92–103.
- [14] 邢维全. 国家审计能否促进农村脱贫?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检验[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6):9–17.
- [15] Sen A. Issues in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J].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81(2):285–307.
- [16] 郑瑞坤,向书坚. 后扶贫时代中国农村相对贫困的一种测定方法与应用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11):144–162.
- [17] 燕继荣. 反贫困与国家治理——中国“脱贫攻坚”的创新意义[J]. 管理世界,2020(4):209–220.
- [18] 潘俊,李靠队,许良虎,等. 环境驱动、冲突协调与政府财务信息披露[J]. 会计研究,2014(6):73–80 + 97.
- [19] 邢成举. 压力型体制下的“扶贫军令状”与贫困治理中的政府失灵[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65–73 + 155–156.
- [20] 刘家义. 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J]. 中国社会科学,2012(6):60–72 + 206.
- [21] Dyck A,Volchkova N,Zingales L.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of the media:Evidence from Russia[J]. 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8,63(3):1093–1135.
- [22] 郭芮佳,池国华,程龙. 公众参与对政府审计腐败治理效果的影响研究——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实证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8(2):19–28.
- [23] 蔡春,朱荣,蔡利. 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理论分析与实现路径探讨——基于受托经济责任观的视角[J]. 审计研究,2012(1):6–11.
- [24] 池国华,郭芮佳,王会金. 政府审计能促进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吗——基于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南开管理评论,2019(1):31–41.
- [25] 朱锦余,李玥莹. 国家审计对碳排放有治理作用吗[J]. 当代财经,2022(9):136–148.
- [26] 汪晨,万广华,吴万宗. 中国减贫战略转型及其面临的挑战[J]. 中国工业经济,2020(1):5–23.
- [27] 张亦然. 基础设施减贫效应研究——基于农村公路的考察[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1(2):28–39.
- [28] 王大哲,朱红根,钱龙.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缓解农民工相对贫困吗? [J]. 中国农村经济,2022(8):16–34.
- [29] 陈骏. 更好发挥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完善国家安全部体系[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1):20–21 + 24.
- [30] 池国华,杨金,谷峰. 媒体关注是否提升了政府审计功能?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会计研究,2018(1):53–59.
- [31] 王善平,谢妙,唐红. 财政扶贫资金审计监管的“无影灯效应”改进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4):89–95.
- [32] 戚振东,姜德波,施平. 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国家审计发展创新——“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论坛综述[J]. 经济研究,2015(1):187–192.
- [33] 王会金,马修林. 政府审计与腐败治理——基于协同视角的理论分析与经验数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7(6):1–10.
- [34] 鄢曼,付文林,范燕丽. 财政依赖与地区减贫增收——基于国家级贫困县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财政研究,2021(7):66–79.
- [35] 张国建,佟孟华,李慧,等. 扶贫改革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政策有效性评估[J]. 中国工业经济,2019(8):136–154.
- [36] 武力超,林子辰,关悦. 我国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8):72–86.

[责任编辑:王丽爱]

Government Audit and Regional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ity Panel Data From 2008 to 2017

ZHU Zunhong^{1a}, FANG Yifeng^{1b}, HUANG Shasha²

(1a. School of Engineering Audit; 1b. School of Government Audit,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ity panel data from 2008 to 2017, the paper finds out by bidirectional fixed-effect model in which the function of “curing diseases”, “preventing diseases” and “economic health check”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while the function of “disease detection” did not directly promote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Additional tests show that the function of “disease detection” can play a synergistic effect with the function of “curing diseases” and “preventing diseases”;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can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government audit on the governance of relative poverty;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udit functions in promoting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has heterogeneity in area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public service gaps.

Key Words: national audit; economic health check; disease examination; disease cure; disease preven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relative poverty